

在 2004 年 8 月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了 1978 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 2005 年 11 月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 90 周年座谈会上，曾庆红同志又重申了这一论断，他在谈到胡耀邦

同志“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后，紧接着就指出：“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领导的这场真理标准讨论，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在现实政治方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生在十年“文革”结束不久的拨乱反正时期。一方面，党中央在政治上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另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又出现了继续“文革”错误的“两个凡是”的方针。邓小平以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和胆识，在“两个凡是”出台不久，就第一个在党内公开批评它不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郑重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标志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后，立即遭到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的严厉谴责并受到压制。邓小平高瞻远瞩，敏锐地抓住这一事件，于 1978 年 6 月 2 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的第一部分就是“讲讲实事求是”，精辟地阐明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在讲话中支持了《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批评了“两个凡是”。接着他通过谈话和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等多种方式，连续进行了大量具体的思想和组织动员，从而在全社会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中央各部和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全国 11 个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中央和地方省级报纸从 6 月开始到 12 月，半年之内共发表 650 篇报道和文章。经过广泛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入人心，为顺利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从此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二是在理论建设上。邓小平重申实事求是，恢复和完善党的思想路线，在“实践真理观”等许多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前一方面的作用，人们感同身受，普遍认同，已有不少文章论述；而后一方面的作用，相对来说论述得比较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谈几点认识，以抛砖引玉。

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历史的产物。

任何理论，特别是划时代的科学理论，都是继承前人的科学成果，同时具备创新性，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欧洲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们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生活在帝国主义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和理论特色。

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续的邓小平理论，它的理论特色又是什么呢？

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还是在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宗教、党的建设等社会各个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我们应该不断地深入学习和研究。这里，我只对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及相关问题中的一个，即“实践标准”，并对它进行初步的学习和考察。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的哲学基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各个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共性，但它们又都各自有自己不同的个性和特色。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例，矛盾学说、实践学说无疑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正是《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应该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个性和特色（或是它的主要特色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与马克思主义导师们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任务不同有关。由于时代和主要任务不同，他们往往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列宁语，《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345 页）。比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在 1893 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创立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他们“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方面，而“忽视”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继承性。此后他们在一系列文章中对此进行深刻论述，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检验真理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不是新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对此既有全面阐述，同时阐述的重点和角度又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处在“怎样去寻找真理”（列宁语）即创立自己的理论年代，他们提出并研究“实践标准”的着重点是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并把它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强调人们“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204 页）。在他们看来，“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多次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以往真理标准问题较多地存在于哲学认识论之中。邓小平生活在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已经创立并经实践证明为真理的时期，他领导的“实践标准讨论”解决的是“两个凡是”问题，即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把它与革命导师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论述的个别原理，特别是个别论断区别开来，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的个别原理，特别是导师同时又是执政党领袖的个别论断，仍然应以实践作为唯一标准进行检验，不能“一句照办”。这是因为多年来尤其是十年“文革”中形成的现代迷信盛行，思想僵化严重，影响到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

王强华

“实践标准”的重点，就更深了一个层次，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根本方法。不仅如此，邓小平领导的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于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且深入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之中，使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得到普及。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邓小平领导的“实践标准讨论”，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的“实践哲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

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即党的思想路线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学习。十年“文革”以后，“两个凡是”坚持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体系，而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错误的东西，它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既不许纠正旧东西，又不许思考新问题。邓小平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极其重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并从此入手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1978 年 6 月 2 日，邓小平在著名的《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思想路线。他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于 1979 年 7 月和 1980 年 2 月又两次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学习邓小平的这三次讲话，特别是比对后两次讲话，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倡导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而邓小平在第三次讲话中明确表述的思想路线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的核心，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认识事物、从事工作的出发点、基本方针，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它们都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强调的是“实际”的重要性。从人的认识过程来看，这里反映的是它的“前半程”、即人的认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和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而人的主观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则要由实践来检验，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则改正，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邓小平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把“实践标准”引入党的思想路线之中，丰富、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邓小平的“实践真理观”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邓小平把“实践真理观”应用于当代中国实际，指引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举两个例子来说，1988 年经济体制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关键时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们对物价（主要是粮食和肉、蛋、菜、糖四种副

食品价格）要不要放开，即由国家统一定价（国家补贴）改变为市场定价（取消补贴），对此意见不一致。邓小平指出：“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开物价，加速改革，正确不正确，也要看实践。”他主张放开，实践证明了这一次举措是成功的，理顺了物价，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对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是这样。固于传统观念，过去长期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属性。中国的经济工作多年来基本上照搬社会主义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结果常常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经济老是上不去。邓小平根据长期实践，以“实践标准”检验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走市场化道路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创造性地提出“计划”、“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也可以走市场化道路发展经济。邓小平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科学理念，冲破了过去的传统观念，化解了困惑已久的“姓社姓资”的难题，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类似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邓小平的态度就是要大胆地去“试”、去闯，在实践中判断对错，对了就坚持，错了就改正，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继续实践，找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方法。江泽民曾在党的十四大上，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外部条件、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全面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邓小平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处处闪耀着“实践标准”的光辉。

“实践标准”谈的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属于常识问题，实践出真知、实践检验真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但为什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这一常识问题、基本原理一经提出并公开宣传，却立即引起了那么强烈的反响？一些人反对、压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支持，并以此为契机，组织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过去已有著述从不同的角度提及并回答了这个问题，本文不拟赘述。这里只简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事实，作为补充和诠释。

1859 年，马克思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以后，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拟公开发表。但开始时却被当局以“不符合时代精神的要求”为借口阻挠出版。出版商故意拖延排印，推迟出版时间。出版以后，又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包括拥护马克思学说的人。这时，恩格斯出来说话，他指出这部著作之所以引起震动并被压制、反对，主要原因是因为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 页）马克思的这一论点，表明的原理非常简单，对于未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所束缚的普通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它却给了“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它“不仅对干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参阅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7—118 页）这样，它引起某些人的反对就毫不奇怪了。

回顾这一段历史，不难看出，无论是一百多年前出现的“存在”与“意识”谁决定谁的争论，还是 1978 年在我国发生的“实践”与“理论”谁检验谁的分歧，虽然都是抽象的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但由于它们与现实紧密联系，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不同人们的不同反应。

这也许就是像“存在决定意识”、“实践检验真理”一类理论问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的根本之所在。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保持党员先进性

发生了“信仰危机”。思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把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上，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奋斗当中，坚决抵制不良风气、不良信息、不良习惯的影响，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

三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拒腐防变，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强大动力。《党章》规定：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只有按照党章的要求，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才能在思想上筑起反腐败的坚固防线，做促进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模范。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能否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的最根本的考验。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由于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个别党员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集体群众利益之上，以权谋私，陷入腐败的泥坑。这极大地损害了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影响了党的战斗力。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区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明确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牢记住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牢牢记住党性原则的思想防线，牢牢记住拒腐防变的前沿阵地。要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做到清正廉洁、勤政务实和敬业奉献，带领群众走好科学发展之路。

四

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与党所坚持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员必然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是贯彻党章的基本要求、实践基础和永恒课题。

一切为了祖国和人民，体现了共产党员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以实际行动，树立起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在和平建设时期，涌现出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等千千万万好党员、好干部，他们的高尚品质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是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含义。要增强执政意识和责任感，切实了解群众疾苦，热心反映群众要求，真诚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千方百计带领群众致富。要把群众的医疗、就业、教育、养老、住房等基本生活问题时刻挂在心上，努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理想信念的集中表现，反映了人们应该确立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理想信念，是人生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是人的精神支柱。今天，为理想奋斗就是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是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矢志不渝地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而奋斗。”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应该确立的理想与信念。在改革开放的复杂环境下，一些党员之所以是非不明，荣辱不分，关键在于

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同志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荣誉与耻辱是社会道德评价体系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作为社会道德意识的荣辱观，它是评价善恶、美丑的道德标准，并引领社会的风向，是社会道德与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告诉人们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社会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褒奖什么、谴责什么，从而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导向。

与会同志指出，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一直高度重视，2001 年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2 年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关于《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讲话，2004 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今年，胡锦涛总书记又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

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忧虑的问题，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一些人心目中淡漠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流行开来。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与会同志强调，促进社会道德风尚进步，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自律与他律的关系。诉诸人们对荣辱的认知和道德的自觉时不能忽视他律，他律既包括制度约束，又包括社会舆论压力。二是知与行的关系。在道德认知上人们问题不大，关键是行，要注意培养人们的道德实践、道德意志的磨练和道德习惯的养成。三是大处着眼与小处着手的关系。要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教育人们认识树立荣辱观的重要性，同时要引导人们从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的细微处辨善恶、知荣辱。四是普遍与重点的关系。应着力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及各类对社会道德风尚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教育。

理论动态

瞿秋白的人权观

赵书刚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撰文认为，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较早地关注中国人权，并且对于人权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他认为，捍卫生存权利是保障其他一切权利的前提，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的当务之急是御外侮、求生存，在军阀、豪绅、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寻求常黑暗，民众一点人权也没有的情况下，瞿秋白提倡反封建、争民主。更难得可贵的是，瞿秋白站在时代的高度，主张把争取人权斗争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适应世界潮流，借鉴西方文化的合理内核，力戒盲目排外，力求打起精神，振兴实业，建设富强的国家。时代铸造了瞿秋白宁死不屈的精神，共产党的神圣使命赋予他刚直不阿的性格。他所争取的不单单是自己的人权，而是千千万万民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大胆地为人权呐喊、勇敢地为捍卫人权奋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论点摘编

用最新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人

由中共锦州市委宣传部编写的《用最新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全书文字不多，但在理论观点表述上准确和科学。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内容结构上，从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的概括，到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的解读，直至科学发展观基本内容的全面阐释上，丝丝入扣、层层深入。读完之后，使人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既可深刻理解，又易领会掌握。另一特色是，本书作为“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口袋书”，便携，便于随身携带，可利用工作之余、开会间隙、出差途中等短时间内进行学习。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

为宣传和推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更好地促进优秀社科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二辑），日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选介了 71 项优秀社科研究成果，涉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领域的 22 个学科。本书各篇成果介绍分别由各课题负责人撰写而成，在体例结构、内容安排、行文风格等方面各具特色。书后附录 2005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名单，为社科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了较好的资料索引。